

马丁·路德及其思想对德国人工作观的积极影响作用

张莉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 重庆市 400031

【摘要】德国人工作观的产生与传承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德国人工作勤奋、自律、节俭、高效、诚信的工作品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组织里，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不同于以往的一种新的世俗公共道德。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及其伦理，特别是马丁·路德提出的“天职观”直接将世俗工作上升到天职（神的旨意）的神圣地位，使人们心中带着敬畏和虔诚去完成世俗工作，对德国人的职业道德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通过马丁·路德、加尔文的理论，如“天职观”“预定论”等探讨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分析马丁·路德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析其如何影响德国人的职业观及其具体表现。

【关键词】马丁·路德；天职观；因信称义；工作观

1 引言

在德国，有谚语说：“Arbeit zuerst, genießen zweitens.——工作第一，享乐第二”，“Arbeit macht das Leben glücklich——工作使生活愉悦”这些谚语诠释了德国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即工作观和职业道德观，也构成了德国人勤勉务实的民族性格，要深刻理解其内涵，我们必须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个体发展为切入点，通过评价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新教伦理思想对新教徒产生的影响，总结出了新教的“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某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同理，马丁·路德的思想对德国人的工作观也存在着某种影响关系，因此，本文尝试分析马丁·路德对德国人的职业道德观的影响，以期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2 中世纪的城市行会——德国人工作观形成的母体

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也就是早期的基督教教义中，工作特指的是体力劳动的概念，大多由社会下层人士或曰奴隶阶层承担，手工业劳动由社会中间阶层承担，自由悠闲则是哲学家、政治家和富人这种上层人士的特权。因而工作并不被视为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惩罚，这可以在《圣经·创世记》中找到缘由：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无需劳作也能享受饱腹。本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伊甸园里，却因两人没忍住住蛇的诱惑违背禁令，偷吃了禁果遂被逐出伊甸园贬至人间接受刑罚——终身劳作。因此古希腊古罗马的人们认为劳作并不是美德而是为自己所犯之罪赎罪。但到了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兴起，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壮大，手工业者和商人等社会中下阶层为了使自己被社会认可以及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寻求心理尊严，开始创办一些社会组织——行会。在罗马帝国早期（公元前27年至公元180年），为了对西班牙及各行省的商业进行有效管理，

罗马帝国便在每个城市建立了商人行会，这一时期就有了行会（Gilde）的雏形。直到11世纪，德国的一些城市中才开始有了成熟的行会形式。行会是由手工业从业者、商人和其他群体组成的一个约束力极强的组织，它有权建立各类作坊、制定行业的运营规则、培养学徒及授予其“师傅”的称号，手工业从业者必须加入对应的行会，并严格遵守其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公共道德。就这样，人数不断增加的手工业阶层逐渐成为德国城市的主导阶层，加之有一套完善运行体系的机构——行会，两者相辅相成对德国社会发展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德国这样一个以工匠为主的社会，其道德品质肯定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从学徒到工匠到师傅，不仅意味着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的提升，还意味着行业对其手工技艺、工作能力以及职业道德的最高礼赞。上层阶级的贵族哲学家们他们的职责与价值就是自由享受，中下阶层的人们也在城市文明进程中逐渐产生了自我意识，即我的价值是什么？工作在贵族阶层和中下阶层之间划了一道鸿沟，那么自我意识觉醒的中间阶层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提升工作的地位以此来证明我的价值，由此，工作对于中世纪德国社会的手工业阶层来说不仅仅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价值取向或曰世俗公共道德。这种世俗公共道德是在行会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来一种的新的道德——行会对手工业者工作道德和工作纪律的重视衍生出了尊重工作、崇拜技术、勤勉、高效、重质量、守秩序的工作观以及世俗公共道德，并以行会中个体对群体作出的贡献为最高价值标准来评价人。行会中的任何人都无特权，不管他的背景、信仰、社会地位如何都必须遵守行会的道德准则。中世纪行会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把工作评价作为最高德行的机构。

3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德国人工作观升华的摇篮

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生来就有原罪，如不诚信是“罪”，贪吃是“罪”，

以及在现世中还会犯各种各样的“罪”，那么我们要赎罪才能上天堂。罗马天主教会抓住信徒想上天堂的心理，大肆向信徒兜售赎罪券，信徒只物质付出，并非发自内心的想赎罪。当时甚至有这样一句宣传语：“当你的钱币在赎罪箱里叮当作响，你的灵魂就飞向了天堂”。马丁·路德认为这与宗教的真正意义背道而驰，由是于公元1517年10月在威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出批判罗马天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由此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拉开帷幕，并很快席卷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统治西欧的局面，使统治权转移到各邦国的国王手中，在客观上加速了德国统一的进程，同时也使基督教内部发生了分裂，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派别，也就是新教。马丁·路德在这之中作出最重要的贡献，一是将晦涩学术的拉丁语《圣经》翻译成了德国普通民众都能看懂的德语，使《圣经》得到广泛传播，推动了宗教世俗化的发展。二是将职业（工作）披上了宗教性色彩，提出了“天职观”，提升了职业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并塑造了德国人的工作观。

3.1 天职观

马丁·路德的“天职观”主要来源于他对《圣经》的翻译与解读。《圣经》中不乏教导基督教徒劳动做工的句子，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西番雅书3:23）；通过对拉丁语版《圣经》的解读，马丁·路德将拉丁语 *Vocatio*（神召，一种内心的感召）翻译为德文 *Beruf*（职业，天职），并用其来表示一切和职业有关的段落文字。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根据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文献探析出德语“*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与英文中的“*calling*”（职业、召唤）一词有着类似的含义，就是它们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布置的任务。因此“*Beruf*”一词就具有了双重色彩，即经济和宗教色彩。一是指一种谋生的手段，二是指上帝给个人的角色安排。在马丁·路德看来，天职具有“世俗性、神圣性和道德性”，不管你从事何种职业，是牧师、修女，还是木匠、鞋匠，只有工作内容不同之分，没有职业高低贵贱之分，每一种职业同等重要，都包含了上帝赋予的使命。他还以鞋匠为例表达了更清晰的思想：鞋和靴是你职业的作品，你的生命只有通过它们才有意义，绝不要超越这个已经为你确定的目标。只要尽心劳动，安于上帝给自己安排的世俗角色，并虔诚的履行上帝安排的任务，就能“荣耀上帝”，继而灵魂得救。这使得世俗工作有了价值，德国人便更加尊重劳动，并恪尽职守、各司其职。

3.2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源自圣·保罗在《圣经·新约》中罗马书部分的表述：“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路德在经过自己的解读后，把这句话翻译为了人称义是唯独因着信（“唯独”一词在保罗的罗马书里是

不存在的）。传统天主教认为灵魂得救的方式是依靠教会及其举行的宗教仪式和做善功。而路德认为，人要想灵魂得救靠的是个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而不是通过教皇、牧师和复杂的圣礼仪式。路德彻底否定了天主教的说法，抨击了教会至上的现实，更加反对出世禁欲的隐修生活，在他看来，远离尘世的修道院生活是为了逃避世俗义务，同时赋予世俗工作更为重要的意义。《圣经》应当是信仰的唯一来源，他给世人开辟了一条通向上帝的新的道路，即个人只要内心虔诚信仰上帝就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不再需要通过教会和上帝对话。既然个人只要过好世俗生活，在上帝安排的位置上全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做得越出色就越能荣耀上帝，那世俗工作就不再是无价值的了，而是事关个人救赎与否，怎能不尽力去做好。在这个信仰至上的时代里，宗教信仰产生的约束力，没有任何一种道德准则能与之匹敌。此外，从这种信仰约束力中衍生出来的职业道德，与一般的工作道德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这是一种具有内在驱动力的、发自内心的、关乎个人是否得救的大事，而不是为了满足外在要求，如领导、权利、行会的要求，需要信徒在心中严格自律。

这种披上宗教色彩的工作观与中世纪行会时期形成的价值观相亲和，直接改变了德国人对工作的态度，与此同时在心中产生了强大的职业道德感，培养出许多精益求精、技艺精湛的德国工匠，并把工作看作是生活的中心，这种工作观逐渐根植于德国文化土壤中，并通过职业教育向每个德国人输送对工作的尊重和工作者应履行的职责，最终是德国人的工作观得到了升华。

4 结束语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的职业观在中世纪行会时期就已形成，但这个时期工作观的形成主要是一种外力驱动，即行会对手工业者的要求。真正使德国人工作观发生本质性转变的是路德的宗教改革及其提出的理论“天职观”“因信称义”，他把世俗工作和“天职”联系在一起，把世俗工作与个人灵魂得救联系在一起，变世俗工作为“上帝使命”，肯定了世俗工作的价值，给世俗工作蒙上了宗教面纱。同时，使世俗工作由外在约束转为内在约束，在德国人内心产生强大的自律，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德国人对工作的态度——热爱、勤勉、敬业、严谨、精益求精的工作品质进一步得到强调，并通过职业教育将这种精神植根于德国每一个公民的心中。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在二战战败后，也能快速重振经济，跻身发达国家前列之因。反观我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对勤俭、敬业、进取、克制等精神的强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的奋斗精神；“尽人事而知命”的担当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积极进取态度。这些文化也催生出了诸如“成家立业”“立人达人”“锤炼本事”“大展宏图”的自我意识，继而衍生出“自立、勤奋、进取、诚

2.3 对教育模式提出新要求

当代大学生的思维活跃、容易接受新的观点、新的现象。“互联网+”技术在各行各业进行融合之后，网络平台上的信息发布者不停的挖掘信息数据来向大众接受者制造卖点，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对信息进行改造，大学生开放的思维更容易被这种激烈的想法所吸引，网络信息数据的海量导致了多元化思潮的泛滥，大学生不易辨别思想的好坏，容易受到有心人的利用。

3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具体实施

3.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思想

在“互联网+”背景下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进行教育模式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学生的教学目与对学生的教学方式的选择，对学生思政教育舆论引导持续加强，避免学生出现思维上的偏差。教师应该根据中国特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将“互联网+”技术合理的运用到对学生的思政教学中。

3.2 坚持以实际课堂为主要教学方式

“互联网+”对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产生的问题进行解决，但是仅仅依靠互联网技术对学生进行教学是不够的，教师的实际教学是不容替代的，“互联

网+”实际上是对传统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升级。教师在实际的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活动中，要始终记得“互联网+”技术是对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课堂的工具。

3.3 坚持教师对学生的引导作用

教师在充分利用“互联网+”给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带来的便捷时，不能忘记发挥教师对学生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思想引领作用。在教师要运用互联网平台对学生进行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时，提高学生的思想高度。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提供了广阔的机遇。根据“互联网+”平台对高校建党与大学生思政教育进行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这个教育平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万瑾，上海人，研究生学历，高等教育学在读博士，讲师，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 [1] 常素梅. MOOC 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启示 [J]. 邢台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12): 11-13.
- [2] 张玉胜. MOOC 背景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J]. 教育观察, 2015(1): 6-7.

信”等工作精神。“成家立业”意识与自我责任感就是中国人色彩的“天职观”。不同于路德提出的天职观，我们的天职观虽宗教成分甚少，但驱动力与路德的天职观不分伯仲。我国传统文化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可利用的

智慧资源，我们要做的就是传承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借鉴他国文化精华，升华职业道德的内涵，并重视职业教育，为中国制造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工匠”。

【参考文献】

- [1] [苏] 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 27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2] 李伯杰. 德国文化史 [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76.
- [德]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M]. 阎克文，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4] 施德军. 论马丁·路德对德国人工作观和职业观的影响 [J]. 湘潭大学学报, 2005, 5 (29) : 65-66.

上接 40 页